



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

◎陶飛亞

衝突的解釋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政治

之命生

五口來百黃國
湖中時歲金萬
湖吃糊三白寶
大盡塗萬玉
為百去六非
上和時千為
死味亡日實
白身空若
玉上度無
黃落人
金在生



馬禮遜入華宣教

200



衝突的解釋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政治

◎ 陶飛亞

衝突的解釋：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政治 / 陶飛亞著；—初版。
—臺北市：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民95）
面；公分

ISBN 978-957-727-250-8（平裝）

1. 基督教-中國-歷史-論文, 講詞等

248.207

95006922

衝突的解釋：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政治

定價 230 元

作 者：陶飛亞

總 策 劃：林治平

召 集 人：林治平

副召集人：魏外揚

編輯委員：王爾敏、查時傑、章開沅、馬敏、吳梓明、李金強

責任編輯：宇宙光文字部

發 行 人：林治平

出版發行：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電 話：(02)23632107 傳真：(02)23639764

郵政劃撥：11546546（帳戶：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網 址：<http://www.cosmiccare.org/Book>

承 印 廠：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經 銷 商：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02)82275988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0012號

2006年7月初版一刷

2007年3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無論全書或部份內容翻印、轉載、或以廣播、錄音帶等方式使用本書內容時，皆須事先告知本社，並於使用時註明出處；如在著作或任何形式發表時，簡短的引用本書內容則只需註明出處。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合作出版

目錄

Contents

自序	5
【一】「文化侵略」源流考	17
一、「文化侵略」提法的形成與含義	
二、「文化侵略」口號的歷史軌跡	
三、「文化侵略」提法在文化方面的影響	
【二】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為什麼會解體—— 與《牛津基督教史》中一個觀點的商榷	45
一、外部環境的變化	
二、從內部改革到要求「分家」	
三、與西方基督教烏托邦的一個比較	
【三】抗戰時期中共對基督教會的新政策	71
一、早期的政策	
二、抗戰時期政策的轉變	
三、太平洋戰爭以後對基督教的政策	
四、政策與實際	



【四】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	87
一、共產國際與非基督教運動的發起	
二、發動非基督教運動的政治動機	
三、對中國非基督教思想的影響	
【五】十九世紀山東新教與民教關係	113
一、適應山東環境的佈道策略	
二、比較慎重地吸收教徒	
三、新教教案的分析	
【六】晚清知識分子非基督教傾向的文化原因	129
【七】山東反教鬥爭與「扶清滅洋」思想	159
一、民教矛盾剖析	
二、士紳與反教鬥爭	
三、官方態度及其影響	



馬禮遜入華宣教

200



衝突的解釋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政治

◎ 陶飛亞

目錄

Contents

自序	5
【一】「文化侵略」源流考	17
一、「文化侵略」提法的形成與含義	
二、「文化侵略」口號的歷史軌跡	
三、「文化侵略」提法在文化方面的影響	
【二】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為什麼會解體—— 與《牛津基督教史》中一個觀點的商榷	45
一、外部環境的變化	
二、從內部改革到要求「分家」	
三、與西方基督教烏托邦的一個比較	
【三】抗戰時期中共對基督教會的新政策	71
一、早期的政策	
二、抗戰時期政策的轉變	
三、太平洋戰爭以後對基督教的政策	
四、政策與實際	



【四】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	87
一、共產國際與非基督教運動的發起	
二、發動非基督教運動的政治動機	
三、對中國非基督教思想的影響	
【五】十九世紀山東新教與民教關係	113
一、適應山東環境的佈道策略	
二、比較慎重地吸收教徒	
三、新教教案的分析	
【六】晚清知識分子非基督教傾向的文化原因	129
【七】山東反教鬥爭與「扶清滅洋」思想	159
一、民教矛盾剖析	
二、士紳與反教鬥爭	
三、官方態度及其影響	

自序

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史學界對近代基督教的研究發生了重要的範式轉移。一般而言，人們可以把這個變化概括為從無到有。從中國史學整體來看，這一領域從極度的邊緣化逐漸變成了一塊新的「邊區」，專題研討會和著作幾乎可以追步當年一些史學熱點問題的討論。這種轉變不僅包括了方法的轉變和研究者背景的轉變，也包括了研究主題的轉變。從單向度地研究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衝突，擴展到多維度的研究其在文化、社會方面對中國的影響；從單純的反洋教敘事轉向對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互動的研究，儘管這場互動是在兩個人數規模極不相稱、社會制度不同的群體之間進行的。80 年代後，學界關心的問題不光是以前帝國主義如何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也注意考察基督教在中國到底進行哪些活動？中國人是怎樣對待基督教或西方文化的輸入的，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以及基督徒和教會團體同周圍的社會環境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總起來說，現代化範式的取向是很明顯的。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很多，重要的一點是在大陸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人們觀察問題的視角變了。不同時段中大學培養的研究者，知識背景和學術訓練也發生了變化，他們對基督教研究的興趣，反映

了探討中國近代史和中外關係史的新氛圍，一種新的比較全面地看待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演變的觀點正在形成。同時，就像許多史學家認識到的那樣，任何歷史的撰述本身也是一種歷史的見證。就本書涉及的廣義上的政教關係來看，筆者是在近代中國歷史的進程中來觀察這種政教關係演變的，大致上始於晚清的民教衝突，終於 1949 年前後新形勢下與反帝運動糾纏一起的基督教問題。當然，我還想指出這種研究不是孤立的，它事實上隨著中國史學的主潮跌宕起伏，其中有些研究，可以看成是對主流史學界討論問題的回應。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在中國大陸，是在研究西洋宗教與中國社會衝突的視野中出場的。因為它的特殊性，一度只有在義和團運動的主題之下，才引伸出對基督教的研究。因此，80 年代的基督教研究就與當時學界關心的義和團運動諸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本書最早接觸的問題是反洋教與義和團運動到底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質。無疑這場運動的擔綱者是農民大眾，但農民為什麼會提出「扶清滅洋」這樣一個反對洋人而擁護朝廷的口號，應該得到合理的解釋。有些論點籠統地把這個歸之於農民的落後與愚昧。本書的做法是考察山東直隸等地參與反教會鬥爭政治力量的實際格局，認識到直魯地區的農民提出或者說接受「扶清滅洋」的口號，是因為他們在這種衝突中感受到了士紳和官府對他們的同情和支持，有些官紳還直接參與或捲入某些衝突。因此，農民使用「扶清滅洋」的口號，正是這個群體中的地方精英對局勢的一種洞察，不僅不是什麼愚昧與落後，反倒是長期與洋教較量的農民一種順理成章的有局限的精明。

80年代後期關於文化的討論一度衆聲喧嘩。這對基督教研究來說，引起了人們關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遇時的社會反應。傳教士作為西方宗教與文化的載體深入到中國百姓生活的各個層面，無疑他們所傳宗教文化的新異性，帶給中國社會各色人等前所未有的震撼。事實是19世紀以來，作為中國文化傳統載體的知識分子經常充當了批評攻擊基督教的主角。原因在哪裡？人們通常會用蔣廷黻的基督教是騎著炮彈到中國的說法來解釋這種衝突。這是對的，但是不夠的，因為早在明清之際，中國士大夫就曾經激烈的反對基督教了。¹因此，筆者覺得有必要從文化上考察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會這麼激動地反教的。結果表明：同樣是在列強侵略的背景下，舊文人基於宋明理學批評基督教的宇宙觀和倫理觀，新知識分子基於近代西方的科學主義來反對古代西方的宗教文化，更激進的則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肯定強化了這種民族性的文化批判，但即便沒有這種政治背景，在中國這樣有自己高度成熟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自豪感的國度裡，一種新宗教的輸入必定面臨著與其它宗教文化爭奪追隨者的激烈競爭。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對基督教一再的文化反彈，正是這種競爭格局的反映，這從一個側面表現了中國文化具有的對外來宗教文化審察和磨礪的活力。

研究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衝突深入下去，就會發現所謂民教衝突，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民有不同之民，教有不同之

1 明末知識分子的反教言論可參見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建道神學院，1996年。

教。以義和團起源地山東來說，「民教之爭、積怨難平」曾是地方官吏的共識，但深究起來當時真正為民衆與社會痛恨的是一些以德、法為背景的天主教傳教士和天主教徒，在有限的地方資源的支配和爭奪中利用這種有組織的力量「撐洋勁」，因此激起民衆的反抗。到後來平民百姓也依托民間結社的傳統，凝聚成有組織的義和拳會與之對抗。而英美背景的新教教會則創辦教育醫療等新事業，引進新的農作物品種和手工業技術，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的需要，在吸收信徒方面小心謹慎，比較少的涉足詞訟，因此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沒有像天主教那樣遭到明顯的仇視。這也說明在基層社會，民衆對基督教的態度，與知識分子關心文化層面的衝突不同，他們更注重宗教團體對周遭社會生活環境的具體影響。

民國之後，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衝突在形式和內容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處境，在五卅運動之後倒了過來，在 1922 年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中，熱衷於文化教育與社會活動的新教教會、尤其是美國背景的教會與男女青年會遭到了猛烈的批判。這場波及全國許多城市的運動，對中國政治、基督教會，特別是此後的政教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於國共兩黨及其它的一些政治派別都涉身其中，因此，無論時人的評論還是後來的研究在探討這一運動時，經常把目光集中在國共兩黨及幾個政治派別身上，很少有人將非基運動與中共剛剛成立、國民黨組織渙散，而俄共（布）及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政局中起著重要作用等問題聯繫起來考察。實際上，忽略這一時期俄共代表在中國政治中的作用，孤立地考察當時中國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基這樣的反基督教反帝運

動，有些問題是很難說清楚的。20世紀90年代以後，俄共的一些檔案逐漸公布，為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本書中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基於這些檔案材料，揭示了爆發於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非基督教運動，實質上是在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共發起並領導的政治鬥爭。俄共及共產國際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青年會及在中國青年中日漸滋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因此，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旨在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削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他們通過反對基督教會實現反帝目標的策略在實踐中獲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畢竟與東正教在俄國的情況有很多差別，共產國際代表以俄國革命反宗教的經驗，來影響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不免有不切實際的、過左的傾向。

非基督教運動的影響應該是相當深刻的，把反對基督教作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要策略，在土地革命戰爭年代還一直出現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共政策上影響的深刻性。但這種情況從紅軍長征結束到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之後，中共從中國實際出發，認識到了要集中力量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與其它西方國家則具備了實行妥協的可能性。在這一前提下，中共對外國教會的方針也逐步變化，一些受「左」傾思想制約的方針和土地革命時期規定的政策開始為新的內容所取代。1936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斯諾的採訪時，對西方傳教士在新政策下所享有的傳教、辦學、擁有土地和經營其它事業的權利作了充分的肯定。

太平洋戰爭之後，中共更從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出發，制定了調整對教會的土地政策、保護教會財產及保護和尊重外國傳教士等方針，表明了中共對宗教尤其是有西方背景的基督教在認識上的深入。儘管在政策與實踐中間仍有許多差距，但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正如它正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一樣，也正在摸索如何處理基督教會問題的辦法。抗戰時期對教會政策的轉變為此後成熟的宗教政策提供了借鑒。

在近代以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衝突的過程中，一個流傳既廣且遠的著名提法「文化侵略」應運而生。它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包括史學敘事中，一度就是近代在華基督教事業的惡諡。近年有人對這一提法提出商榷，有的明確認為這是政治口號，不能簡單地在學術研究中套用。美國學人也在討論這一提法，有的認為「文化侵略」在國際關係中是存在的，但強調這種侵略只有在政治經濟及軍事壓力同時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美國晚近的論著批評從前只看到「傳教士與中國人之間權利的不平等」，而忽視了中西相遇複雜性導致的「思想與印象的雙向交流」。這些看法不無道理，但都疏忽了這一提法的歷史性，忘了它首先該是歷史研究的對象，然後才能考慮它學術領域中的作用。筆者認為應該返回歷史中清理它的源流，希望這一探討能彌補革命話語研究中長期忽視的一個側面。梳理這一話語的源流，證明了 20 世紀初西方在華宗教文化活動的持續擴張引起國人的憂慮，至 1920 年代的非基運動中，瞿秋白等把西方這種活動概括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務於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一面，成為反帝話語中的利器。不過，在現實生活中是否使用這一提法來針對西方在華文化事業並不是一成不變

的，它明顯受國共兩黨對外關係取向的影響。在實際影響的層面上，「文化侵略」提法顛覆了五四以來對西方文化單純肯定的傾向，喚起國人對外來文化滲透的警惕和反抗，也迫使這些外國在華宗教文化事業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國化進程。但這一基於反帝鬥爭需要的提法，一度固化為人們集體記憶中對近代西方在華文化事業的全面認識，影響和限制了此後相當一個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因此需要用辯證的態度來看待革命話語的歷史遺產。

以上的探討都是在研究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關係，觸及的都是基督教運動外圍的或者說是其附屬事業的問題，從這些邊緣問題深入下去，真正的基督教史應該是從基督教自身的運動中來發現其歷史。比如基督教傳教運動的宗教動因和目的，傳教者傳什麼樣的宗教信息及怎麼傳遞這些信息的，信徒皈依的原因和結果，宗派差別等都是一些基本的問題，但這樣的研究還剛起步。對 19 世紀末造成新教嚴重分歧的基要派與社會福音派之爭，對新教運動中性別研究等更付闕如。特別是基督教運動從西方差會到中國教會的演變，這是世界基督教史上意義深遠的跨洋宗教移植的關鍵問題，但這在中外史學研究中都是非常薄弱的。本書考察的耶穌家庭運動正是針對基督教學術史中的這一缺失展開的，同時也是在社會史意義上關注基督教宗教理念的輸入對近代農村社會變動產生了什麼影響。

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西方新思想紛至沓來，但真正直接以農民為宣講對象的，也許要算基督教了。流傳到農民手裡最多的文本可能是各種各樣的《聖經》及有關的宣傳小冊子，而教會的各種事業如學校、醫院或其它慈善事業也可

能是農民最容易接觸到的新鮮事了。這對於想要改變現狀的農民客觀上提供了一種新的思想資源。太平天國起義是暴力運動的例子，而耶穌家庭則是在基督教烏托邦思想引領下建設理想家園的另一種類型。本書的研究討論了基督教與烏托邦思想的內在聯繫，考察了山東泰安馬莊的農村基督徒知識分子是如何在本土民間宗教傳統的基礎上，接受了美國神召會五旬節主義的宗教經驗和千禧年主義，並以神召會既是教會、又是一個兼有農場工廠和學校的自給自足的基督教社團為榜樣，走上了取消私有財產、取消家庭生活、所有信徒共同勞動生活、生老病死由團體負責的基督教烏托邦主義的道路。從古代托名孔子的「大同」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到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烏托邦思想在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但只有耶穌家庭把烏托邦思想付諸實踐，真正在社會生活中檢驗了烏托邦思想的魅力和局限。在這裡，為什麼世俗文化中說到做不到的事，而基督徒竟能實行幾十年，基督教教派思想所提供的思想動力、組織能力和凝聚力值得深思。

耶穌家庭因其獨特性，曾經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較多關注。因為史料與視角的緣故，看法每有不同，特別在耶穌家庭最後解體問題上，海外學界常把外因看的過於重要。例如著名的《牛津基督教史》中，有關作者認為耶穌家庭在1950年代對基督教愛國三自運動態度強硬是導致其處境艱難的原因，但事實正好相反，耶穌家庭成員對三自運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耶穌家庭解體的真正原因在於解放後社會安定民生改善，在戰亂中興起的這個基督教社團失去其存在的社會環境，家庭中年青人通過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接觸外界社會後，對極度封閉的烏